

三青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以組黨風潮為中心的探討（上）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

●王良卿

一、前言（簡述黨團關係的雙重面向）

一九三八年成立的三民主義青年團（以下簡稱三青團），是為配合中日戰時統一領導的構想所建立的組織，另一方面，也是在中國國民黨（以下簡稱國民黨）部分成員形象欠佳、有失革命活力的背景下，應運而生的團體。蔣中正認為，國民黨本身的整頓改造將是吸引國內其他黨派參與合作的先決條件，為重振部分黨人業已遺忘的革命精神，他促成以同樣具有組織基礎、人力資源的前復興社青年幹部為三青團重心，期對國民黨形成

刺激作用，並圖擴大國民黨政權的社會基礎——特別是全國青年的支持。

從一開始，國民黨就顯露直接領導三青團的意圖，然而實際上，兩個組織的同一最高領袖蔣中正（國民黨總裁、三青團團長）未予支持。為了避免國民黨的掣肘，以及樹立足夠號召人心的吸引力起見，三青團享有自主運作的地位，不受國民黨的「直接統轄」，①並且迅即被塑造成一個國民革命新血輪的形象。然而，這項設計的用意加上派系政治滲透的結果，馬上變了質。首先是來自黨方對三青團性質與地位的質疑，繼而為團方分離意識的抬頭，兩造爭擾不斷，體制、成員吸收均呈雙

軌競進的態勢，雙方活動交疊至政治領域，彼此難能共濟，反成水火，以致三青團成立不到一年，蔣中正與國民黨、三青團中央，都開始爲了調整黨團關係而發出政策性宣示與制訂多項法規。這些補救措施力促三青團以校園作爲主要活動場域，三青團且被期望加強組織的敎育（而非政治）性格，團員入團年齡也爲著釐清黨團關係及分工區隔的需要而受到緊縮，不過這些規定很快就被證明難能填補黨團之間的鴻溝。

事實上，三青團與國民黨共享政權的政治資源，例如高級領導人（包括首魁）與三民主義的信念，以及「在朝不在野」的政治地位等。根據統計數字顯示，三青團團員兼具國民黨黨籍者，大致總徘徊在團員總數的一成五上下，幹部兼有黨籍的比例尤高，惟其主要職務多在團部，本位意識強烈——就此面而言，三青團儼然在國民黨內之一派系。另一方面，三青團具有自成一格的組織與可資動員的下層基礎，最高負責對象爲團長蔣中正而非國民黨，國民黨對三青團的組織、人事任免調遷始終無實質過問權力，團的經費也不仰黨鼻息，團也全非人們所想像是國民黨用以吸納預備黨員的組織②——就此面而言，三青團則又形同國民黨外一自主性組織。

職是之故，三青團一方面以派系身分投入黨內政治競爭，爲黨內派系政治的參與者（中央層級尤是）；一

方面則以自主性組織的身分同國民黨時相頡頏，爲國民黨的有力政敵（地方爲最）。這種模稜兩可的雙重面向，使得黨團關係長期陷於低迷，三青團的地位亦始終無定，反彈聲浪不絕。③前述調整黨團關係措施和一九四五年三青團改隸於政府之議，曾經先後試圖對三青團給予不同程度與方向的定位，然均無疾而終。一九四六年，機會來到三青團自己的手中，此即圍繞著三青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而起的組黨風潮。本文即以一九四六年的三青團二全大會爲題，利用原始檔案、私人日記、憶述文獻、報章報導等資料，回溯組黨風潮的背景，以及二全大會召開前與召開期間的相關情節，並分析全代會後三青團新的權力格局，評估該風潮在黨團關係史上的意義與影響，期能提供更多、更具價值的觀察線索。

二、憲政前之新局

對應於國民黨，三青團成員多以國民革命新血輪自況，泰半具有本位、分離、取而代之等意識，其間程度之別，仿如漸層光譜，而與黨頡頏的心理則一。三青團在擴充組織能量的過程當中，採取自力發展與對外結盟的廣泛模式；作爲一個國民黨政權下的龐大派系，亦涉足黨內的政爭以求均霑利益。這種權謀政治在戰後運用得更爲淋漓盡致。④另一方面，三青團在同一時期內的

本位意識依然濃厚，大部分地方基層幹部與不具黨籍的團員仍舊對國民黨深感疏離。

抗戰後期，大後方若干知識分子特別對國民黨治績發為廣泛指摘，黨員同聲內抨；各界多論及憲政問題，實則開放政權，政壇中人對此新局不能不表關切。時重慶方面對「兩黨說」多所論及，三青團引為自身絕佳出路，曾於幹部會談中集議改建兩黨事宜，且在幹監聯席會議裡公開討論，中央常務幹事何浩若等人主張尤力，指稱國民黨允宜分為兩黨，以免中共成為第二大黨云云，有關結論並均呈送蔣中正核閱。^⑤

戰後中國的民主、和平呼聲更為高漲，國民黨開放政權不日將屆，黨內有心者頗感切急，三青團部分成員組建新黨之議尤其未或稍歇。自贛南時期即追隨蔣經國的王昇同此主張。據王昇日後回憶當時個人看法，認為執政的國民黨在政治現實中背負無限責任，動輒得咎；且國民黨自北伐後滲入地方集團勢力，已見異化，黨的革命精神也因追求官宦而漸漸消褪。王昇指出，凡此包袱，三青團均無，且在現實中三青團組黨正是時機，蓋不僅可成為政黨政治下忠於三民主義的反對黨；復在「還政於民」聲中，得以濟國民黨革命屬性轉化不易之窮；且兩黨政治符合美國方面的期待，國人也增一政治選擇機會。^⑥

王昇的見解不一定符合政治現實，例如美方就不一定對三青團抱持友善觀感，^⑦但在三青團內，這類主觀想法確非王昇一人或某個派系所獨有。^⑧另一方面，來自團內渴盼組黨的主觀願望，也憑藉著戰後團務發展成績斐然，以及團方本位意識幾達高峰的客觀背景而更形強化。

三青團於一九三八年成立後即熱衷擴充成員數量，馴至抗戰結束當年（一九四五），團員數已逾百萬；戰後一年間，尤為三青團積極廣納新員的時期，此和戰後環境便於吸收（同艱困的戰時相較）、搶在憲政粗肇之前擴大組織影響力有關——到一九四六年底為止，團員數已逾一百五十萬人，國民黨與三青團成員比例也在這一年縮減至八年以來最為接近的數字（二・三〇：一）。^⑨由於三青團自行控制其成員與組織，因此，三青團的發展成就幾乎不能帶給國民黨黨務機器任何提振效果，相反的，可能還有極大的環伺與威脅成份。

為因應來日的憲政新局，一九四五年國民黨六全大會決議三青團改屬於政府，然而此舉卻讓隔膜已深的黨團關係推入再難挽回的境地。^⑩首先，由於黨團之間最後僅存的「形式上」的統屬接榫點自此廢除，三青團儼如脫韁之馬，而所謂三青團改隸政府的決議其後又遲遲未見履行，國民黨在此期間仍動輒對三青團施行指導行

爲，就法規而言已屬師出無名，團方徧急者之不耐可以想見。⑪即使連新桂系的白崇禧也認爲，默察當前政治形勢，三青團發展方向與革命建國前途關係至爲密切，團既不屬於政府，黨團關係不能一仍舊貫，必須立加調整。⑫

其次，三青團自成立後，「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團之地位與立場，始終在模糊動蕩之間」，⑬久之不免頓起反彈，要求承認其政治現實地位的呼聲甚囂塵上。就此角度而言，改隸政府用以訓練青年的決議對三青團並非延續利益的最佳途徑；況三青團積累的利益所在，尚不限於政治圈內，即以團營事業爲例，亦屬可觀，一旦實施改隸作業，未見得都能繼續充份有效掌握，凡此均爲三青團內具備政治認識者思考未來走向時，不能不審慎慮及之處。⑭

根據三青團方面的文件顯示，改隸之議在一九四五年六月四日，即黨六全大會閉幕未久，三青團中央幹事會舉行臨時全體會議，會中決議三青團組織方式及各級機構與工作暫時不變，至於一切改隸辦法，則授權三青團中央常務幹事會研討規劃。⑮惟三青團中央對規劃事宜似未積極，及至八月，蔣中正仍囑三青團中央幹事會書記長張治中，限期呈報三青團改隸政府後如何加強

業務的具體方案。⑯一九四六年三青團中央幹事、監察會一份工作報告則表明，改隸之議使得三青團的性質與地位，以及一切有關團務的方針計畫，均不得不準備重行通盤檢討與修訂，而這其實並無助於解決三青團自認的幾項團務推展障礙；再者，團內各級幹部反而多因三青團地位變更，及改隸一案不能早獲適當解決，「情緒日趨低落，工作效率不無重大之減削」。同年，另一份由中央幹事會提出的工作報告則乾脆指出「此爲推行團務期中之一大頓挫」。

有鑑於此，三青團中央曾擬訂一份〈三民主義青年團設置綱要草案〉與三點處理意見，經團長蔣中正批准後，轉令各級團部，「以安定幹部情緒」。然而這些辦法既不具備法律效力，又完全沒有提及實施改隸時間，看樣子仍以安撫功能居多。嗣因國內政治情勢急轉直下，國民大會一再展期，三青團改隸日期也隨之緩延，最後，即將在一九四六年九月召開的三青團二全大會，顯然就成了衆所矚目，且期待徹底釐清，或者建立三青團此後性質地位的絕佳場合。⑰

多年以來，黨團關係始終混沌不明，三青團的性質與地位在名實之間頗有差距，亦從未獲得有力解決。⑱試觀一九四六這一年，三青團的組織發展成就達到空前的頂峰，本位意識和由於改隸一案所激化對自身前途的

不確定感也更加強烈。除了前幾段所述事例之外，三青團成員參與地方各級參議會選舉所獲成績，同樣是三青團在戰後力求政治表現，與本位意識高漲的另一明顯註腳。「湊巧」的是，國民黨政權為回應憲政呼聲所辦理的這場全國性地方民意代表普選活動，基本上也發生在一九四五年底至一九四六年間。

戰時三青團已提示團員積極參加地方自治、充實民意機構，以求未來憲政圓滿實施。^{①⑨}依照一九四五年國民黨六大大會通過的〈促進憲政實現之各種措施案〉第三條的精神，戰時在後方各省縣市為促進省政興革而非經選舉方式成立的原臨時參議會，應依法循序普選，俾成為正式民意機關；^{②⑩}同年九月二十九日，三青團中央幹事會通令發動各級幹部及優秀團員踴躍參加競選，且將專案考核各級團部參選成績，嚴行獎懲之。^{②⑪}

表一：各地三青團團員競選各級參議員當選人數統計

單 位	省（市）參議員 總數	團員當選數（正 選）
黔	一五三	二六
湘	—	—
渝	—	三三
川	—	一三
青	五二	一二
陝	九四	二八
閩	六八	二三
康	—	—
鄂	六九	二一
寧	—	—
滇	—	五
臺	一九	七

各地參議員經由地區或職業團體兩種途徑選舉產生。以地區論，三青團一向積極投入地方基層工作，別具打樁效果，據稱截至一九四六年三月為止，整整有百分之六二的團員從事地方工作，有些人當了區長、保甲長的職務，這些都是能夠提供基層票源的重要樁腳所在；^{②②}另就職業團體來說，三青團同表重視，亦為平日組織動員的主要來源之一。三青團的參選成績令人矚目，根據一九四六年六月止若干省市團部呈報團中央的一份不完全統計結果顯示，在省級的參議會方面，臺灣、福建、湖北、陝西等地的三青團，均取得三成以上的正選席次，臺灣更達到百分之三七；在湖南各縣市的參議會裡，三青團平均占有百分之四三的正選席次，其在省內各隅政治影響力之強，實不言可喻。（表一）

！・資料來源空白未載

備註：一、本表據一九四六年六月止中央幹事會所收各單位呈報結果彙編而成，爲一不完全統計，僅供參考。

二、團員占各級參議員總數比例係按正選人數統計，不含候補。

三青團藉由各地參議員競選結果，能夠充分檢驗多年來的組織發展績效；透過數字化的當選成績，也大致可以展現其具備的政治實力。然而，三青團民意基礎愈趨擴張，當政的國民黨愈感威脅。對於國民黨而言，其他黨派尚無從施予可觀之選戰壓力，除了在地士紳程度不一的影響力之外，以優異組織能力見長的對手只有本位意識強烈、政治企圖心旺盛的三青團而已，職是之故，黨團競以選局為戰場，交鬥之烈遍及各地。這種政治競爭態勢，尚且延續到參議會正式組成後，各勢力間的合縱連橫行為接續不斷，牽動地方政局至鉅。^{②③}

可以這樣說，三青團中央與各地組織在中日戰後至二全大會之間所蘊積的相關政治表現、本位意識，能量確屬可觀。其間諸多「事件」，可能都是基於歷史的偶然而兜攏在一起，並且在一九四六年的全代會上，對出席人員的政治憧憬起了催化作用。但是就「局勢」來說，前述提及的事件，都和抗戰後期開始，來自政權內外要求開放政治的潮流有關，三青團從中發展茁壯，二全大會中的組黨政潮已非單純的偶發事件或意氣之爭所能解釋。另以黨團關係欠缺穩定的「結構」及其伴隨的困擾觀之，當能想見政權中人遲早必須面對這道難題，並尋求智慧性的解決。調整黨團關係措施和三青團改隸於政府之舉，曾經先後試圖對三青團的地位給予定位，然

均無疾而終，現在，機會來到三青團自己的手中。從各種角度看來，三青團二全大會都會是那些亟欲將黨團關係與三青團性質地位作一徹底解決，以迴護公私利益或組織尊嚴的人們之希望所寄。

三、蔣經國的崛起

相對於三青團在國內政治地位的提昇，團內聲望漸高的另一名領導者蔣經國也特別獲得人們的注目。標榜行動價值的蔣經國是蔣中正的長子，一九二五年赴莫斯科孫逸仙大學就讀，國共決裂後滯蘇，一九三七年始返回中國。一九三八年四月，經正式批准成為國民黨黨員。在這之前，蔣經國前往江西接受政治歷練，一九三九年任江西第四區（贛南）行政督察專員，七月，受派為三青團江西支團部籌備處幹事兼籌備主任。在蘇聯長達十二年的思想學習與勞動經驗，構成青年蔣經國異於一般官僚作風的大部分特殊人格。除了與蔣中正那令人注目的血緣關係外，他在中國最先的聲名應從贛南算起。在建設贛南的過程中，蔣經國援引大批青年作為工作重心，其中一些年輕人往後成了蔣經國政治生涯裡的得力幹部。^{②④}

由於黨齡、資歷尚淺，戰後初期的蔣經國仍未具有國民黨中央執行或監察委員身分，然而，在三青團內，

蔣經國已躍居等同於國民黨中常委地位的中央常務幹事。早在一九四四年，蔣經國還控制了甫經設立的三青團中央幹部學校，照以後的歷史看來，他逐步瓜代了前復興社末任書記長康澤在三青團裡的制式權力與地位。

先前負責青幹班實權的三青團組織處長康澤，對繼起的中央幹部學校頗思掌握，但一九四三年六月十五日，自兼校長的蔣中正任命蔣經國為該校教育長，連同親蔣經國的復興社成員胡軌稍早於四月被派任組織處副處長一事，康澤已感權散之憂。^{②⑤}一九四四年五月一日，中央幹部學校研究部第一期正式開課，校內不設黨部，只建立團部，學生一律入團，教職員生均須參加團的集體活動，校務實際由蔣經國主持。此後所謂的蔣經國系，除了原贛南派的基本隊伍外，再添一規模更形龐大的幹校派，活動範圍也自江西一省擴展至國內各地。^{②⑥}同年十月起，國民黨與三青團發起知識青年從軍運動，並徵集編練為青年軍。蔣經國先後受派為青年軍政工人員訓練班主任、青年軍總政治部主任，幹校派師生從而和青年軍政訓工作合流，蔣經國勢力自此跨入軍界。^{②⑦}

蔣經國在江西主持團務初期曾得復興社成員胡軌輔助，然最大的人事阻力也源自復興社內的康澤系統。一九四五年時，蔣經國「主要職務全在於渝」，^{②⑧}同康澤的競爭益趨白熱化。蔣經國原已汲引不少復興社分子於

甫經草創的中央幹校裡襄贊校務，^{②⑨}俟蔣經國實際控制中央幹校和青年軍，三青團中央人事更經一番動盪，根據一名先親康澤後投蔣經國的復興社成員陳開國的說法，幾個復興社分子透過蔣經國的運作取得了更有力的位子。一九四五年八月一日這場人事搬風最受人關注者，首推倪文亞取代康澤出任組織處長，倪、康二人雖同屬復興社，但意義截然有別：攬持三青團組織重任長達七年之久，並曾在三個月前的國民黨六全大會中展現可觀政治實力卻反遭蔣中正質疑是否有計畫控制會場的康澤，此時形同失勢；倪文亞的出線一般則視為蔣經國掌權前的過渡階段。透過書記長張治中，蔣中正暗示康澤辭卸組織處長職務，並安排於十月十五日自重慶搭機出國考察，至此，蔣經國在三青團內的最大政敵已去。^{③①}

一九四六年五月，國民政府還都南京，未久，隨著蔣中正於七月十四日抵達廬山牯嶺，該年夏天的中國政治重心乃暫時轉移到這個自古馳名的消暑山城。時國共停戰協定已遭破壞，內戰全面爆發，美國特使馬歇爾於七月十八日起，兩個月內八上廬山面蔣，續圖力挽現狀；另一方面，在國民黨政權內，經年爭執不下的黨團關係也即將在這個天氣饒富變化的名勝所舉行的三青團二全大會上面臨攤牌。^{③②}

在自主呼聲日高的三青團這邊，由於中央幹事會書

記長張治中被發表為西北行轅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陳誠銜命於四月再度出任書記長職務。陳誠在七月披露一份他所草擬的〈青年團工作綱要〉，指係提供二全大會代表們作為提案參考。這份綱要似乎排除了近來團內部分成員的過度激情，強調：「團與黨為一個整體，團要接受黨的領導，黨要輔助團的發展，彼此密切配合，共同為三民主義而奮鬥。」面對可預見的組黨政潮，陳誠毋寧採取比較折衷溫和的立場，他主張三青團應鼓勵團員以工作競賽方式參加各種政治活動，而三青團中央幹事、監察會的陣容當中，應逐漸減少那些兼具國民黨中央委員或高級幹部資格者，以選拔部分下級優秀幹部加入三青團中央機構，俾能培養新機，充實力量。^{③②}

在三青團各級團部仍富人脈的康澤，此時尚滯留美國，同時，蔣經國則著手整合利己勢力。先是蔣經國藉著原青幹班一至五期畢業學員改劃為中央幹校政治科第一期身分，及改組青幹班同學會為中央幹校校友會的機會，取得若干已在各地團部主導團務的原青幹班勢力的表態支持。青幹班同學會原是康澤為掌控三青團一全大會而成立，在一九四六年六月下旬於重慶舉行的中央幹校校友會成立會上，前青幹班同學會常務理事陳開國代表致詞指出今後「班、校是一個整體」，並接受蔣經國的「統一領導」；蔣經國則強調今後班校一家，是兄

弟關係，各地校友應努力爭取充任二全大會代表，為團的「改造」出力。透過青幹班勢力，蔣經國除江西支團部外，還獲致若干省市團部幹部的奧援，例如上海支團部書記曹俊、重慶支團部書記羅才榮等，對蔣經國均表擁戴。^{③③}

蔣經國另一重要政治基礎為青年軍。一九四六年初，蔣中正即指示籌畫青年軍復員事宜。一月間，蔣經國在中央幹校召集親信胡軌、俞季虞、張一清、蔡希曾等人會商，他透露蔣中正對青年軍復員的看法，指出復員不是青年軍的結束，而是青年軍新發展的開端，今後青年軍不僅當為國軍後備菁英，亦應加強政治組訓，使成為社會的新興革命力量。^{③④}七月，青年軍復員檢討會議在廬山召開，會中討論青年軍的復員安置、徵集第二批青年軍等問題，蔣經國並經蔣中正指派擔任國防部預備幹部管訓處（原為青年軍復員管理處）代處長，掌握實權。^{③⑤}大約在此前後，蔣經國以三青團中央常務幹事兼青年軍總政治部主任的身分，向中央團部建議給予青年軍中的團員選舉代表出席二全大會的權利，獲中央常務幹事會通過，一百六十一名青年軍代表遂成為蔣經國系在三青團二全大會裡的一支基本力量，占出席代表（不含中央幹事、監察等所謂大會出席人員）總數的五分之一強。^{③⑥}

四、組黨的提案言論

與一九四三年舉行的三青團一全大會相較，青年軍代表自是二全大會獨具的特色，二全大會出席者另一特色係學生代表名額遽增。一全大會時，具備在學學生身分的團員代表只有二十一人，占出席代表（不含中央幹事、監察）總數的百分之六·五六，當時會場內對代表年齡偏高的事實曾有非議；^{③7}二全大會裡的在學學生則大幅擴增至一百七十名上下，約占出席代表（不含中央幹事、監察）總數的四分之一。^{③8}這些學生代表與為數更多的地方代表，對於另組政黨一事至感熱衷，^{③9}前者在國民黨內並無過多利益糾葛，反倒是基於青年熱血，亟欲尋求自主地位及打破國民黨一黨獨大現狀，而後者正是在地方政壇上直接與國民黨黨務部門對壘的團務操縱者，對國民黨的名器同樣不表留戀。

二全大會召開之前，學生代表與地方代表的組黨態度已然形成一股熱潮，廣受輿論界及政壇中人矚目。三青團書記長陳誠於一九四六年七月披露的〈青年團工作綱要〉草案裡籲請黨團一體的文字沒有發揮太多的指標作用，相反的，三青團的分離意識充斥在各方對二全大會的提案當中，包括促請確定三青團為一獨立政黨、政治團體、獨立組織、重行確定三青團性質等。^{④0}雲南支

團部就認為，三青團應將現有組織另行改為政黨，俾於憲政實施之後以新姿態出現。^{④1}甘肅支團部更聲言代表該省「十二萬革命青年」，呼籲將三青團的組織改組為獨立政黨：

就團的歷史言，原為中（國）國民黨所提攜之一體的核心，然就團的性質言，則屬以青年為主幹之三民主義的新生組織，而以團的發展言，尤以蔚為富於革命精神之三民主義的新生力量。如以青年為革命運動的新血輪，則此新的血輪業有充沛的循環系統；如以團為三民主義的新生命，則此新的生命早已茁壯健全而長成，當茲民主政治高潮澎湃（一）抗戰既勝（一）建國期成的新時代，（為）發□（揮？）新生力量（一）爭取革命效率，實有關揚團的精神，改組獨立政黨之必要。^{④2}

甘肅支團部指出，三青團實已具備革命政黨所必需的基本條件，而在建設三民主義新中國的過程中，也已經取得「追隨中國國民黨駢肩奮鬥共同努力之政治地位」，「世界政黨既各依其政綱政策以爲分合消長之因素，則中國國民黨與青年團亦可各本自身之歷史與精神改進既有之政綱政策，切磋競勉，攜手邁進（一）外分而內合，相輔相成，並存於三民主義的體系之中」。甘肅支團部接著提醒，國民黨現已面臨「歷史上最複雜而至岌危

之政治難關環境」，三青團爲「革命之友，奸黨之敵」，「爲增樹中國國民黨的聲援，爲參加當前的政治鬥爭，亟有揭櫫團的旗幟，改組獨立政黨之必要」，他們強調此舉刻不容緩，建議這個新的政黨應稱爲「三民主義共和黨」，以揉合憲法精神，示其生命與中華民國同一生命。^{④③}

一份由駐港九澳直屬區團部主任韓文溥、福建支團部書記吳春晴、福建支團部監察林一鵬、福建支團部監察會書記張公甫、福建支團部海澄分團籌備處主任林永年、貴州支團部幹事長季天行等十七人連署的提案，條文分明的縷述了三青團不能再維持舊狀或改隸政府的理由。他們對八年以來團員在撲朔迷離、牽制過多的黨團關係下「忍耐掙扎」，甚至「由苦悶而趨消極」的現象表示憂心；尤足憾者，一月間舉行的政治協商會議涵括了國內重要黨派成員，唯獨三青團「以黨團一體之故，竟抱向隅」。韓文溥等人警告，國內黨派如雨後春筍到處公開活動，「一齊衆楚，勢使本黨陷圍，如再堅持黨團一體，侷限自己的發展，亦即削弱自己的力量，於黨於團，均屬失策」。

提案人表示，維持舊狀，顯違創團初旨，權衡利害，今日三青團確有決定另一生存形態的必要。這份連署提案接著指出，憲政實施後，各黨派既經並存，自可公

開活動，原先三青團改隸政府以避免「政治野心家」援例爭取青年的用意也已不符形勢需要；況三青團如實行改隸，「有一般工作意識，無神祕之革命特質」，而對各級組織及幹部地位問題也不易解決。總之，三青團不能維持舊狀，不便改隸政府，「如改隸政府，其優秀傳統將被腰斬，如維持舊狀，則其苦鬥之歷史，亦覺難於持續」。韓文溥等人似乎認爲，三青團改組爲政黨將可提振組織的效率、權力，以及成員的革命情緒，提案辦法項下建議三青團應師法孫中山組織中華革命黨的精神，改爲獨立政黨，「以繼承革命傳統」，不過，同甘肅支團部一樣，他們特別強調此一新黨與國民黨之間的友黨關係，這個想法是否出於至忱尙待存問，不過意在泯除國民黨政權中人對三青團的疑忌則可確定。^{④④}

有些提案內文未觸及組黨字眼，而以獨立政治團體爲願望，實際亦與組黨無異。例如由幾位中央幹事、中央候補幹事、中央候補監察與部分地方、學校團部高級領導人（含幹事長、主任、書記、幹事、監察）以個人名義連署提出的一份案子中，就呼籲三青團應即脫離國民黨的隸屬關係，俾能成爲獨立政治團體。這些三青團菁英認爲，黨團關係從未明確劃分，導致全國青年由不滿政治現狀進而不滿國民黨，更由不滿國民黨而對三青團感到失望，致使三青團失卻號召力量；同時，三青團

的革命性與吸引力，也因為欠缺政治主張與地位而大幅降低。提案指出，三青團一旦獨立，「以本團今日組織之發展與團員之衆多，必能取得第二大黨地位，減低共產黨在國內國外之政治作用」，並且，三青團與國民黨「雖各成獨立政治團體，但主義與目的仍屬一致，將來在對外鬥爭上可以互相策應，在對內工作上可以互相競賽，如此不僅不致分散革命力量，而且可收相輔（相）成（、）殊途同歸之效」。^{④5}

地方與學校代表為三青團二全大會上鼓弄組黨風潮的主力，部分中央幹事、監察間助之。事實上，多數中央幹事、監察對此抱持穩健立場，他們主張增強三青團的獨立性，黨團幹部絕對分割清楚，不再混兼，黨籍團籍亦須涇渭分明，但不另組政黨。^{④6}無疑的，這種態度較趨於審慎，^{④7}惟若與黨方形同頑抗的意見相比，自主意味顯然又濃烈得多。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就有解散三青團，代以成立國民黨青年部的想法，但格於環境時勢，無從提出；在三青團內，以中央常務幹事陳立夫為首的少數CC系分子主張維持現狀，惟此議不符實際，甚至未能迎合團內最起碼的自主要求，故可謂團內黨方的咄咄空論。^{④8}

有關三青團前途問題的討論，早在九月一日二全大會開幕之前即已瀰漫廬山。青年軍復員檢討會議閉幕後

，三青團於七月二十四日至八月二十三日間調集各大專院校幹部，在廬山接受青年夏令營洗禮，受訓期間正值二全大會召開之前，活動地點也和全代會多所重疊。在夏令營結業之後，部分學員以全代會出席代表的身分續留廬山，連同稍早已到的各地出席全代會人員代表——僅以八月二十一日為止的抵達人數累計（時尚未開始辦理報到），即已合占全體與會者的七成。^{④9}自蔣中正七月到臨廬山，當地頓時湧至京、滬、漢等地的重要媒體記者，蔣氏行止動見觀瞻，《新聞天地》記者更譬喻政治的動力機已由南京搬到牯嶺。隨著廬山夏令營以及二全大會與會者的陸續到來，二全大會行將決定三青團性質及黨團關係一事，也成了廬山上的公開談論焦點，要求組黨或成為獨立政治團體的提案一件件的遞送給全代會秘書處，《大公報》記者報導了學生及地方代表強烈主張組黨的局面，但指出兩點難處：一、黨魁問題；二、黨籍問題，一人勢難兼為國民黨員與新黨黨員。儘管如此，記者目睹山雨欲來的態勢，還是肯定的說道：「青年熱血，會場中必有一番辯論。」^{⑤0}

註釋

①儘管國民黨從全代會以下，經中全會、中常會，均以提案決議權與條文規定等途徑，清楚表明了三青團的

從屬地位，然而三青團團章則通篇未見有界定黨團關係的具體條文。實際上，團務也一直朝著自主的方向前進。進一步的討論，參見：王良卿，〈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關係研究（一九三八—一九四九）〉（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九六），頁八二—九三，以下簡稱〈關係研究〉。

②雖然爲了迎接三青團誕生，國民黨在一九三八年廢除了總章有關預備黨員的條文，但是此後國民黨仍然致力招納青壯分子，三青團則始終保有自己號召來的成員。進一步的討論，參見：王良卿，〈關係研究〉，頁四七—四八，九四—九九，三〇八—三〇九。

③該雙重面向爲研究三青團組黨行爲時，應加留意之處。本文限於篇幅，不及詳述，讀者可逕行參見〈關係研究〉，各處。

④革新運動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由於和黨內最有力派系CC系在革新運動中的合作，團方在一九四六年三月取得六分之一的國民黨中常委席次，是爲三青團前所未有的勝利。參見：王良卿，〈關係研究〉，頁一七四—一九一。

⑤王世杰，《王世杰日記》，第五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七十九年），一九四五年四月五日，頁六二；雷震，《第一個十年——雷震日記》，

第七冊（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九〇），一九五八年六月二日，頁三〇二；白瑜，〈我所知道的復興社〉，干國勳（等著），《藍衣社復興社力行社》（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七十三年），頁一〇一；鄭彥棻，〈永懷唐乃建兄〉，私立臺南家政專科學校（編），《唐乃建先生紀念集》（臺南：編者自印，民國七十一年），頁二〇九。

⑥尼洛，《王昇——險夷原不滯胸中》（臺北：世界文物出版社，民國八十四年），頁九九—一〇一。

⑦美國朝野有將三青團視爲法西斯組織、特務機關者，蔣中正知悉這些人的看法，參見〈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屆中央常務幹事會第三十一次會議紀錄〉，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八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典藏朱家驊先生檔案。另見：劉先雲（口述），遲景德、陳進金（訪問），陳進金（紀錄整理），《劉先雲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民國八十四年），頁一三七—一三八。

⑧例如在三青團內主張兩黨說不遺餘力的何浩若，其見解亦大致如是，程思遠，《政海秘辛》（香港：南粵出版社，一九八八），頁一九五。

⑨參見：王良卿，〈關係研究〉頁九四—一〇八所提供的數字、表格與討論。

⑩國民黨六全大會決議通過黨的總章修正案，原第五條內容正式刪除，三青團自一九三八年起存在於國民黨最高章程裡的一段文字到此終結。因此，從一九四五以後，國民黨與三青團之間，事實上已無任何法制形式的聯繫了——儘管這種法制形式從來就沒有獲得團方應有的重視。更多的情節，參見：王良卿，〈關係研究〉，頁一五七，一六四—一六五，一六八—一六九。

⑪因此，從國民黨六全大會以後，三青團的地位要較以往更顯得尷尬不明。有關國民黨續行指導的例子，參見：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編），《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紀錄彙編》（臺北：編者彙印，民國四十三年四月），頁三七，五二—五三，七〇—七一，一一三，二三〇，二三二，二四八—二四九，三六三，以下簡稱《六屆中常會紀錄》，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藏（以下簡稱（黨））。

⑫白崇禧在一九四六年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後，將他的想法及三種案子呈送蔣中正參考，蔣隨即批交給黨團雙方核議。就目前可以取得的國民黨官方文獻來看，五月十五日舉行的國民黨中常會推派了一個跨派系的小組負責研究這個問題，含白崇禧、陳立夫、梁寒操

、陳誠、朱家驊、吳鐵城、劉健群等七人，由吳鐵城、陳誠召集之。第三十次會議，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五日，《六屆中常會紀錄》，頁二二四。

⑬三青團中央幹事會書記長張治中在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日呈遞給蔣中正的意見書裡所言，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上冊（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五），頁三五五—三五六。

⑭以日報與經濟事業為例——截至一九四六年六月為止，亦即三青團二全大會召開前三個月：經三青團中央補助，由各支團興辦的日報凡十六種，出版地均為通都大邑；各級團部總計開設紡織、造紙、印刷、電氣、煉油等工業場廠共十九個單位，生產合作社二十所，消費合作社四十七所，農場十三所，林場三十一所。《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屆中央幹事會工作報告（三十二年四月至三十五年六月）》，一九四六年八月，頁一九四—一九五，二三三—二三四，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以下簡稱（二）），七二八／〇二〇。

⑮《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屆中央幹事會臨時全體會議紀錄》，一九四五年六月四日，《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屆中央幹事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紀錄》，附錄，頁一二六—一二七，（黨）五一九／四一。

⑯《總裁兼團長親筆簽署：研擬青年團改隸政府後如何

加強業務方案限期呈核手令》，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黨）一三七／五四，毛筆原件。

⑰《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屆中央幹事、監察會工作報告》，一九四六年，頁一—六，（二）七二八／〇二六；《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屆中央幹事會工作報告》，一九四六年八月，頁三，四七。

⑱一個饒富興味的例子是，八年來，三青團團員一直拿的是「團員入團臨時登記證」，而非正式的團證，中央直屬國立中正大學分團就向二全大會提案強調說，三青團既是「永久性之革命組織」，上述現象「實足影響社會人士對本團之觀感，即團員本身亦難免疑竇而動搖信心」。中央直屬國立中正大學分團提，〈請切實整理團籍並換發正式團證案〉，《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提案彙錄》，第五冊，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日，頁四，（二）七二八／〇三八。

⑲《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編），《三民主義青年團史資料第一輯初稿》，上編（南京：編者印行，民國三十五年），頁一八四—一八五，以下簡稱《團史資料》。

⑳《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紀錄》，一九四五年五月，頁二〇一。

㉑〈中央幹事會命令〉，青幹組字第七二二〇號，一九

四五年九月二十九日，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編印），《中央團訊》，第三卷第二期（重慶：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一日），頁三。

㉒參見：李清悚，〈南京市參議會的派系鬥爭〉，《江蘇文史資料選輯》，第三輯（南京：一九八一年七月），頁一四九；陸寶千（訪問），鄭麗榕（紀錄），《黃通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八十一年），頁二四一；羅才榮，〈懷念包華國陳介生兩先生〉，羅才榮，《才榮文稿》（臺北：川康渝文物館，民國七十二年），頁七三—七四；Lloyd E. 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 Press, 1984), p. 103.

㉓關於國民黨與三青團在地方參議員選舉，以及參議會組成後的競爭，參見：王良卿，〈關係研究〉，頁二〇〇—二〇一。

㉔王良卿，〈關係研究〉，頁七八—八〇。

㉕根據康澤的說法，以往三青團重要人事案，康均參與意見，而團一全大會後的中央人事改組，不僅沒有讓他參加意見，連組織處的兩個副處長人選，也沒有徵詢他的意見，康澤認為這是因為張治中開始捧蔣經國

來打擊他的緣故。詳見：康澤（遺稿），姚孔行（提供），〈康澤自述（六）〉，《傳記文學》，第六八卷第二期（臺北：民國八十五年二月），頁一一〇；陳開國，〈青幹班和青幹校始末記〉，《文史資料選輯》，第七四輯（北京：一九八一年八月），頁五九一六〇；謝然之，〈從馬家寺到復興關——回憶經國先生創辦中央幹校的往事用以紀念他逝世一周年〉，《傳記文學》，第五四卷第一期（臺北：民國七十八年一月），頁一七；蔡省三、曹雲霞，〈蔣經國系史話〉（香港：七十年代雜誌社，一九七九），頁七八一八〇；郭緒印（主編），〈國民黨派系鬥爭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頁六一四一六一五；江南，〈蔣經國傳〉（臺北：李敖出版社，一九八八），頁一二四—一二五。蔣中正於一九四三年六月十五日手令教育長一職由蔣經國擔任，在未到職前，由三青團訓練處長李惟果暫行兼代。八月十一日設立籌備會，並派蔣經國為主任委員。十月二十六日起接收青幹班設備。十二月一日教育長蔣經國到職，中央幹校正式成立。

②⑥蔡省三、曹雲霞，〈蔣經國系史話〉，頁八〇，九八—九九；陳開國，〈青幹班和青幹校始末記〉，頁六二—六三。

②⑦詳見：陳開國，〈青幹班和青幹校始末記〉，頁六〇—六四；蔡省三、曹雲霞，〈蔣經國系史話〉，頁一二五—一三六；康澤（遺稿），姚孔行（提供），〈康澤自述（六）〉，頁一一〇—一二二；郭緒印（主編），〈國民黨派系鬥爭史〉，頁六一六—六一七；江南，〈蔣經國傳〉，頁一二七—一二九。

②⑧蔣中正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八日致蔣經國電，引自：程思遠，〈政海秘辛〉，頁一七四。

②⑨蔡省三、曹雲霞，〈蔣經國系史話〉，頁八三—八五，八八—九一。

③〇一九四五年五月國民黨六大全大會的幕後，崛起不到七年的三青團，以康澤為中心，至少聚攏了黃埔系與復興社兩支基本力量，並夥同朱家驊派、新桂系、政學系等派別，形成一聲勢浩大的聯合陣營，用以防杜原在黨機器裡占據主控地位的CC系續行壟斷，並謀求個別派系利益的擴充。各派主要攻防點為行將改選的中央執監委員席次問題。據康澤回憶，一九四五年七月下旬某日，張治中告訴康澤稱，蔣中正近來數度責斥康澤把持三青團造反。康澤自付從六大全大會閉幕後，蔣中正即不再約見康澤，「大會開得不好，對我可能有些誤會，加上張治中和陳立夫們的浸潤中傷，可能誤解更深。」是以康澤認為，張治中轉述蔣的責語

即或有夸飾之處，但應非完全捏造。康澤遊歷歐美，直到一九四七年三月國民黨六屆三中全會召開前逕行返國為止，共計一年五個月。康澤（遺稿），姚孔行（提供），〈康澤自述（六）〉，頁一一五——一一七；〈康澤自述（七）〉，〈傳記文學〉，第六八卷第三期（臺北：民國八十五年三月），頁一一二——一二二；〈康澤自述（八）〉，〈傳記文學〉，第六八卷

第四期（臺北：民國八十五年四月），頁一一五——一九；康澤，〈蔣介石為什麼叫我到襄陽去當第十五綏靖區司令官〉，〈湖北文史資料〉，第十輯（武昌：一九八四年九月），頁一；陳開國，〈青幹班和青幹校始末記〉，頁六四；羅才榮，〈我為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工作〉，羅才榮，〈才榮文稿〉，續二（臺北：川康渝文物館，民國七十九年），頁三〇；李以助，〈兩度相隨蔣經國的經過及見聞紀實（下）〉，〈傳記文學〉，第六七卷第五期（臺北：民國八十四年十一月），頁九三；程思遠，〈政海秘辛〉，頁一七四；蔡省三、曹雲霞，〈蔣經國系史話〉，頁一七二；〈團史資料〉，頁九〇；重慶《掃蕩報》，一九四五年十月十六日。

③參見：謝寶珠，〈牯嶺記者群怎樣獵取新聞〉、章，〈蔣主席在夏都牯嶺〉，〈新聞天地〉，第一五期（

上海：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十五日），頁一五——一八；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一九八〇），頁七六七。

③陳誠，〈今後團務發展的途徑〉，一九四六年七月，（二）七二八／二一二；南京《和平日報》，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在陳誠正式視事之前，副書記長劉健群曾暫時兼代書記長一職。

③陳開國，〈青幹班和青幹校始末記〉，頁六七——六九；蔡省三、曹雲霞，〈蔣經國系史話〉，頁一七三——一七五；陳敦正，〈動亂的回憶〉（臺北：元霞書舍，民國六十八年），頁八三；國立政治大學校史編纂委員會（編撰），〈國立政治大學校史稿〉（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國七十八年），頁一五六。根據陳開國的說法，蔣經國仿照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把原中央黨務學校的畢業學員列為第一期畢業學員的先例，建議將原青幹班畢業學員納入中央幹校體制，此議經蔣中正批准後，蔣經國即授意胡軌和在中央幹校任事的原青幹班同學江海東、詹壽山等，與青幹班同學會常務理事羅才榮、鄭森榮、陳開國商量，其後經過更多位的常務理事互相交換意見，覺得雙方都能藉此受益，於是同意改組青幹班同學會為中央幹校校友會，由蔣經國統一領導，並於六月下旬舉行中央幹校校友

會成立會，蔣經國、胡軌亦到。不過，根據當時親蔣經國的蔡希曾回憶，之前不少青幹班學生早已見風轉舵，自稱為蔣經國的學生。俟這一年的春天，在重慶各部門任職的青幹班學生爲了取得中央幹校學籍，正式集會聚餐，聯名向蔣經國上致敬書，蔣經國偕同胡軌、王政、蔡希曾等親赴會場。

③④ 蔡省三、曹雲霞，《蔣經國系史話》，頁一三七—一三八。

③⑤ 羅長安，〈國民黨青年軍及其廬山會議〉，《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二輯（南昌：一九八三年九月），頁八〇—八二。

③⑥ 蔡省三、曹雲霞，《蔣經國系史話》，頁一七五。其中有緊急取得團籍始當選代表者。青年軍代表人數係依三青团二全大會印發的代表手冊內載名單逐一清算得來，《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手冊》，一九四六年九月六日，（二）七二八／〇〇七。

③⑦ 〈各學校團隊出席學生代表名單〉，《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事會關於出席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各學校學生代表補課補考問題的來函》，一九四三年，（二）五／〇一五七四；《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人員名冊》，一九四三年四月，（二）七二

八／〇〇六；王世杰，《王世杰日記》，第四冊，一九四三年三月三十一日，頁四九—五〇；張治中，〈樹立團的作風〉，一九四三年四月十日升旗禮講詞，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編印），《青年通訊》，第三卷第四期（重慶：民國三十二年四月三十日），頁三三。

③⑧ 精確的數字仍待尋求。全代會召開前，上海《大公報》指出學生代表占代表總數四分之一強，上海《大公報》，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日。筆者在代表手冊裡依據各人年齡、學歷、現職等欄的記載，推測出一百七十人上下的參考數字，這個參考數字大致可以證實《大公報》的報導。谷正綱於全代會閉幕後對記者表示學生代表占有四百多名，這個數字顯然被誇大了，也許谷的原意是學生代表占有出席代表總數的四分之一，南京《和平日報》，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八日。

③⑨ 參見上海《大公報》在二全大會召開前與召開期間的報導，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日；九月五日。另見：蔡省三、曹雲霞，《蔣經國系史話》，頁一七六。

④⑩ 特種審查委員會提合併審查各案一覽表，《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紀錄》，一九四六年九月，議案全文頁一七〇—一七三，以下簡稱《團二全紀錄》。在出席大會代表的四十二件關於三青團性

質地位的提案當中，只有三個團體在案由裡明白呼籲黨團結、黨團一元化、加強黨團聯繫，他們是中央直屬西北農專分團部（提案第八號）、東北大學分團部（提案第一〇八號）、上海法學院萬縣分院分團部（提案第六〇六號）。

④雲南支團部提，〈請重新確定本團性質案〉，《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提案彙錄》，第五冊，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日，頁三一，（二）七二八／〇三八，以下簡稱《團二全提案》。

④甘肅支團部提，〈遵照三民主義改進政綱政策繼承團的組織改組獨立政黨以期順應時代潮流適合國家需要發揮新生力量完成國民革命案〉，《團二全提案》，第七冊，一九四六年九月六日，頁六〇，（二）七二八／〇三八。

④同前註，頁六〇—六二。

④韓文溥等十七人提，〈確定本團為獨立政黨案〉，《團二全提案》，第五冊，頁八一—一二。這項提案建議三青團的名稱及組織維持不變，並尊奉創立者蔣中正為領袖。

④提案人為中山大學分團部幹事長任國榮、湖北支團部書記劉先雲、四川支團部書記許伯超、雲南大學分團部股長李紹武、中央候補幹事周天賢、中央大學分團

部代表步天凱、河北支團部代主任張興周、貴州支團部幹事鄭代恩、西南聯大分團部股長曹振庸、中央候補幹事寇永吉、中央候補監察胡維藩、顧鈞如（所屬團部與職銜不詳）、中央候補幹事兼漢口區團部主任郎維漢、中央候補監察張超、中央幹校訓導陳茂銓、河南支團部書記周南、社會教育學院分團部監察陳定閻、中央幹事劉世達等十八人。從提案內文將獨立後的三青團與國民黨等同視為「獨立政治團體」，以及提案人以中國第二大黨相期於獨立後的三青團看來，這項提案的目的實際上與要求組黨並無差別。任國榮等十八人提，〈為適應當前政治環境及革命需要，應重新確定本團性質及地位案〉，《團二全提案》，第五冊，頁一一二。提案人主張：為保持三青團的革命歷史，獨立後的新政治團體名稱仍應照舊，至於領袖人選則由蔣中正考慮決定之。

④上海《大公報》，一九四六年九月五日·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p. 102.

④筆者尚未見到當事人對其原因做出解釋，易勞逸同樣引用了上海《大公報》的報導，但他也沒有提出任何分析。幾個可能的線索是：這些三青團的中央級幹部涉入國民黨政治過深；仍未能偵知蔣中正對三青團走向的最後、最真實的態度；擔心三青團一旦組黨將會

是個別派系或個人的得利；或者，只是純粹因為在上位者習見的審慎保守作風所致。

④⑧上海《大公報》，一九四六年九月五日·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p. 102. 只有極少數人另外提出特殊的意見，例如中央幹事張其昀建議仿效美國田納西流域管理局 (T.V.A.) 的制度，改三青團為全國青年管理處，做為學校以外訓練青年的常設機構，並與教育部、國防部、工商部合作，授與青年各種有用技術，從事生產事業，朱高影，〈三民主義青年團之研究（一九三八—一九四七）——國府爭取青年運動領導權之努力及其挫敗〉（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八十一年），頁一五七—一五八。

④⑨南京《中央日報》，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八月二十四日；南京《和平日報》，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梁上賢、田秉德，〈三青團在湖北的組織與活動〉，《湖北文史資料》，第七輯（武昌：一九八二年十二月），頁六五；劉先雲（口述），遲景德、陳進金（訪問），陳進金（紀錄整理），〈劉先雲先生訪談錄〉，頁一三〇—一三一；蔡省三、曹雲霞，〈蔣經國系史話〉，頁一七六。

⑤⑩謝寶珠，〈牯嶺記者群怎樣獵取新聞〉，頁一五；上海《大公報》，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日。



（圖右）詞致會大表代國全次二第團年青義主民三臨蒞席主正中蔣，日一月九年五十三國民
（圖左）。場會出步後詞致